

# 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 健 马创军

**摘 要:**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迁和升级都对慈善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契合关系,可以发现慈善事业作为生产关系中的上层建筑,不仅要适应生产关系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第三次分配制度创新之要求,更要适应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新质生产力能级跃升之需要。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改进劳动资料和拓展劳动对象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动力。然而,由于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方面仍面临困境,所以须从以人为本、和衷共济以及融合为要的角度,积极培养高素质慈善人才,夯实公益慈善数字底座,拓展慈善事业劳动对象,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作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2-0081-0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sup>[1]</sup>。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质”上存在根本区别,其是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生产力<sup>[2]</sup>,是传统生产力的跃迁与升级<sup>[3]</sup>。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在于“以新促质”,即通过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其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于“生产力”<sup>[4]</sup>。目前,学界不同领域学者尝试从多元化视角探索新质生产力与其术业的内在关联与耦合逻辑。例如,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产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进步,赋能数字乡村建设<sup>[5]</sup>;通过助推产业体系的完整化、安全化、创新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sup>[6]</sup>;通过优化产业

结构、调整贸易模式、平衡财富分配、培养战略性人才等,促进共同富裕<sup>[7]</sup>。概言之,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强势动能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增强发展动力、改善发展结构、拓展发展内容以及优化发展要素,从而赋能高质量发展<sup>[8]</sup>。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关乎共同富裕之大计<sup>[9]</sup>。第三次分配自2021年8月中央财经会议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之后,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并将第三次分配列入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为公益慈善事业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使公益慈善事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从第三次分配的内涵来看,厉以宁教授认为在市场机制和

**收稿日期:** 2024-07-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体系建设研究”(23&ZD180)。

**作者简介:** 李健,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经管学院慈善与社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191)。马创军,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经管学院慈善与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91)。

政府干预之外,存在“道德的力量影响下的收入分配”<sup>[10]</sup>,并指出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在得到纳税后的可支配收入时,出于自愿和爱心,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做出的捐赠”<sup>[11]</sup>。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所主导的资源分配并非只有慈善事业,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分配实践<sup>[12]</sup>。因此,本文将“第三次分配”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范畴,并基于广义范畴展开分析。狭义的第三次分配仅包括慈善捐助,是指社会公众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其实质是高收入阶层的资源捐献,并利用社会的机制来援助低收入阶层<sup>[13]</sup>。广义的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活动等方式,进行扶贫济困、关怀弱势群体等,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sup>[14]</sup>。近年来,研究者从文化视角、制度视角和机制视角等不同维度审视第三次分配的实现路径,强调了社会慈善伦理、互助文化、志愿精神的倡导以及相关制度、机制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未来需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良性生态格局<sup>[15]</sup>。

第三次分配代表着除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条资源分配路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慈善事业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方面不可或缺。我国慈善事业的兴起,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分化和资源占有差异化的客观产物,也是政府不断深化改革和持续优化与社会、市场等关系的必然走向,更是社会文明不断演进的重要标志。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下,慈善事业作为我党为民宗旨的重要实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sup>[16]</sup>,需要通过建立高效协同的慈善体制机制,以高质量的慈善制度指导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的慈善事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sup>[17]</sup>。推动高质量的慈善事业发展,需要处理好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国道路与西方理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处理好慈善募款与慈善服务的关系以及处理好扎根与发展趋势的关系<sup>[18]</sup>。同时,数字化改革裹挟平台治理的浪潮,掀起我国公共管理范式革命,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慈善”凭借其动员能力强、参与门槛低、宣传效果持续等优势,成为我国慈善领域具有活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新模式,演绎着慈善事业发展新形态<sup>[19]</sup>。

要而论之,从概念层面,学界已基本廓清新质生

产力、第三次分配以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意义,但对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还很不充分,或者说鲜有涉足。于我国而言,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重要成果,同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交集匪浅。一方面,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和推动;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也离不开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所形塑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因此,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必要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契合关系入手,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 一、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 1. 新质生产力与第三次分配的互动逻辑

新质生产力和第三次分配看似两个不同的概念,实则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二者围绕共同富裕实现逻辑互动,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为第三次分配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上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第三次分配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补充,其目标是把不断做大做优的“蛋糕”切好,促进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为共同富裕创造更加公正的社会环境。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创造社会财富和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动力。作为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增量效益,为推动第三次分配奠定更为坚实、良好、可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充足的精神养分。第三次分配所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助于弘扬社会公益精神,激发人们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这种精神与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创新、高效、绿色等理念十分契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和文化土壤,在促进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推动全体人民的精神富裕。“在人类道德的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互助而不是互争。甚至在现今,我们仍可以说,扩展

互助的范围,就是我们人类更高尚的进化的最好保证。”<sup>[20]</sup>然而,“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sup>[21]</sup>。这种矛盾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为了调节这种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以第三次分配为代表的互助共同体。在互助共同体中,人们相互间形成紧密的有机联系,每个成员都能够积极参与到互助活动中。这种互助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帮助,更包括精神层面的支持、理解和关爱。通过互助,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意识,而这种凝聚力在资源整合、激发创新、提高效率等方面对新质生产力乃至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

## 2.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逻辑

一方面,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锚定第三次分配。马克思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置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提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22]</sup>。作为生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次分配,触及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所创造的新价值。这种新价值需要通过慈善事业、民间捐赠和志愿行动等渠道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结果进行再分配,以及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尚未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进行再分配。新时代,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分配制度的协同发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慈善事业要紧密围绕第三次分配进行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驱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次富裕社会阶段,人们物质条件相对有利,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自身利益而无需做出巨大牺牲,这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慈善意识更容易被激发,进而愿意参与到慈善活动中,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利益让渡,而这正是第三次分配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也就是说,慈善事业作为实现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在这个阶段借助社会成员的自愿行为,将资源向更需要的群体转移,促进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实现更均衡的社会状态。在第三次分配驱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慈善

事业的主体包括捐赠者(个人、企业等)、慈善组织、志愿者等,客体则是接受慈善援助的各类对象和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明确主体和客体,有助于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精准定位,更好地发挥资源调配作用。从遵循原则与手段来看,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不仅要遵循公益性、互益性、社会性等原则<sup>[23]</sup>,还须通过资金捐赠、物资捐赠、志愿服务、公益项目等多样化手段,实现资源从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从社会优势领域向薄弱环节的转移,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机制协同作用来看,慈善事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如资源募集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督评估机制等,与第三次分配的整体机制相互协同。有效的慈善事业运行机制能够提高第三次分配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资源合理分配;同时,第三次分配的宏观机制也为慈善事业提供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支持,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二者共同推动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和社会公平。

## 3.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互促载体。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会受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sup>[24]</sup>。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生产力是基本矛盾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社会整体进步。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sup>[25]</sup>。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核心要素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仅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促进了慈善事业领域内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不仅调整着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拓展至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新型互动。

借助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先,高素质劳动者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支撑。这不仅体现在劳动

者对慈善理念的深化和专业技能的积累上,更在于劳动者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增强独立性和自主决策能力,持续释放创新潜能,适应慈善事业不断变革的需求,即新质生产力要求慈善事业劳动者逐渐由传统的捐赠执行者向具备高素质与多技能的综合型慈善工作者转变。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捐赠执行者,而是更多地扮演着慈善策划者、社会创新者和公益倡导者的角色。其次,先进劳动资料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革新动力。在慈善领域,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以技术创新和深度应用为核心,整体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提升了慈善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也推动了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如:从慈善募捐的在线化、智能化向慈善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发展;从慈善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向实现慈善资源优化配置发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先进的劳动资料通过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革新着慈善服务的供给流程,不断提升慈善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成为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关键支撑。最后,劳动对象扩展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保障。传统的慈善劳动对象主要局限于物质援助和直接服务,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慈善劳动对象已经扩展到具有高新技术化、数智化、虚拟化以及自生成性特征的新型劳动对象。这些新型劳动对象不仅包括经过数字化改造的传统慈善资源,还涵盖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出的新型慈善产品和服务,如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救助、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的沉浸式慈善体验等。

#### 4. 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契合关系

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并非简单线性的影响关系,而是呈现多元协同性的耦合发展关系,三者俨然已构成一个整体性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水平、资源的分配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系统的存在状态,而系统的演变则受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生产力、分配制度作为刚性元件具有稳定性,慈善事业作为弹性元件可塑性空间较大,三者作为独立单元,在节点的联结下成为连续体,形成闭环,其相互反应所产生的能量作用于整个系统,从而产生复杂动态。

在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所组成的整体性生态系统中,新质生产力是促进增长的驱动性因素,第三次分配是系统调节机制,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内部反馈机制,其

通过增强反馈的正面作用,提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运行效能。三者之间基于势能转换发挥作用,相互联结,协同发展(见图1)。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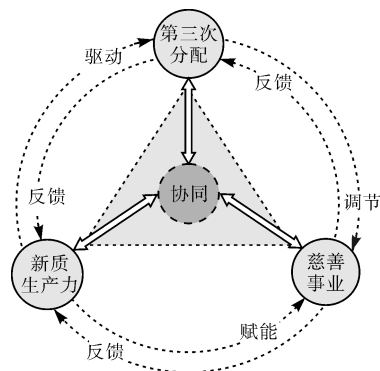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契合关系

其一,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和技术总量呈现爆炸式增长,推动数据、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催生出新质生产力<sup>[26]</sup>。作为数字时代技术颠覆的杰出成果,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扩大可分配的财富总量,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分配效率,提高第三次分配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而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发生着深刻变化,如“互联网+慈善”的兴起实现了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慈善管理系统实现了捐赠资金的全透明和可追溯,科技向善理念推动慈善模式的创新发展。

其二,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社会经济体系中分配机制的优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作为一种重要的干预和调整机制,第三次分配通过调整社会资源结构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如弱势地区教育资源的增加可以为更多优质劳动力群体的产生创造条件。同时,第三次分配通过资源动员,可以促进慈善资源整合,有力提高慈善事业发展质量,进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的协同发展。

其三,慈善事业的反馈作用。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显著增强社会资本,巩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网络,而具有高度信任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社会环境则是培育创新精神、促进多元主体合作的必要外部条件,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同时,公益慈善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与展示平台,更多新技术、新成果都可以通过公益慈善方式惠及广大群众。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动能。然而,新质生产力在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所内含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这三种生产要素,如果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和使用,将会影响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 1.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劳动者困境

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在生产力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生产工具只有被劳动者所掌握,劳动对象只有被劳动者所确立,三者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可见,劳动者本身的变革是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性和主导性因素。传统生产力要求专业型和技术型劳动者,而新质生产力则需要知识型、数字型和创新型劳动者。在此背景下,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就需要以科技创新为出发点,以高质量人才为支撑,以民生改善为落脚点,但目前高质量人才的缺口依然较大。

一是复合型特性造成人才存量不足。不同于传统的慈善人才,新质生产力要求具有慈善实践能力和数字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该类人才深耕慈善领域实践,具有强烈的慈善精神和较高的解决慈善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该类人才能够熟练掌握实现慈善技术数字化、产品和项目设计数字化、募捐捐赠数据分析、志愿参与人员数字化等方面的数字应用技术。双重的人才技能要求限制了可选择的潜在人才规模。

二是职业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人才引进。当前,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不高,职业评价体系也不健全。同时,受政策要求、业务属性、资金限制等条件的影响,慈善行业难以提供具有较高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影响数字化人才的引进。有报告显示,慈善组织因员工福利提供不足的问题面临顶尖人才流失的风险<sup>[27]</sup>,限薪政策也不利于慈善行业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三是教育培训体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慈善组织总数超过1.3万家<sup>[28]</sup>。然而,《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报告(2021)》显示,自2019年开始,国内高校才开始系统推进慈善教育;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仅有35所高等院校开展公益慈善专业教育,培养的慈善专业本科毕业生

不足千人<sup>[29]</sup>。与慈善组织的数量相比,我国慈善人才培养的体量远远不足,遑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 2.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劳动资料困境

科技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标识,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强劲动能。然而,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生变革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差异性问题的。

一是慈善事业数字化转型迟缓。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浪潮成为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基本遵循,但我国互联网公益捐赠(3.9%)与其占数字经济的比重(38.6%)依然存在约10倍的差距<sup>[30]</sup>。这种差距并非数字技术本身所致,而在于数字技术应用于慈善事业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障碍,如慈善组织在提升数字化能力方面存在认知瓶颈、数字壁垒和数字鸿沟,行业数据沉淀不足与行业协作机制不健全,监管机制相对滞后以及慈善行业生态建设不足等。

二是数字慈善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产生偏离。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与慈善的融合发力能够推动慈善事业在数字社会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新。各大互联网筹款平台和头部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的数字技术、流量优势、平台算法等不断拓展慈善事业所能触达的场景,俨然成为数字慈善的主导者,慈善价值的守望者和传播者,但这种数字化赋能可能改变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和价值基点,致使慈善事业被商业资本裹挟,进而影响慈善事业的本质和社会效益<sup>[31]</sup>。

三是对新型慈善工具的接纳和学习不足。慈善事业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样,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环境也必然使慈善事业的发展战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相较于传统慈善的治标(即减轻苦难的严重性),现代慈善则力求以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sup>[32]</sup>。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速创新和深度应用,数字技术已然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技术进步与社会价值紧密相连的科技向善理念指引下,催生了诸如慈善金融、捐赠人建议基金、影响力投资、社会影响力债券等新兴工具,它们同样需要新技术、新业态的加持和赋能。然而,这些工具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依然存在认识误区和信任危机。

### 3.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劳动对象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劳动对象从传统的物质

生产领域向更广泛的社会发展领域扩展,这促使慈善事业的关注点和投入领域亦随之扩大。然而,在劳动对象转型过程中,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劳动对象拓展的困境。

一是劳动对象转型的认知困境。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束缚使部分慈善组织和人员陷入惯性思维,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持怀疑或观望态度,缺乏主动参与和融合发展的理念和意识。同时,不同慈善组织对于新质生产力在慈善领域的理解和应用程度也存在差异。以腾讯、阿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作为科技赋能慈善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公益模式创新,推动公益全方位融入公众生活场景;而力量薄弱的传统中小型慈善组织因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差异以及组织机构数字化转型滞后,难以在统一的平台和框架下实现协同发展。

二是慈善需求预测的异步困境。通过积极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的工具,慈善组织可以更快速、准确地收集、处理和分析各种捐赠人意愿、受助人需求等信息,确保慈善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然而,在实践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常常处于信息边缘,向外界有效传递信号的能力极为不足,成为大数据难以触及的“盲点”,常常被排除在数字慈善的救助范畴之外。同时,由于慈善需求中涉及对他人福祉的深切关注和情感表达,但基于算法模型的大数据本身代表的是工具理性,难以捕捉数据背后隐藏的人的深层情感和相关诉求,使得慈善需求中的情感和人文因素与算法模型的理性要求之间存在脱节。

三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融合困境。在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的背景下,信息的快速传播和资源的高效调配本应成为组织的运作优势,但传统慈善事业中存在的部门割裂现象导致不同慈善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影响慈善资源配置中的组织协调。同时,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过程,需要众多领域和行业的有效参与,如科技、金融、教育等。然而,这些领域之间也存在行业壁垒和利益冲突,其在融合过程中对自身利益的优先考虑往往导致慈善事业的整体目标被忽视或边缘化。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质

生产力的提出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动力和战略抓手,同时也对慈善事业系统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维度加快变革,逐步勾勒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 1. 以人为本:培养高素质慈善人才

高素质慈善人才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只有持续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三者有机协同,才能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慈善事业在数字化、创新化的趋势下,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需要公益实践能力和数字化技能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为此,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激励政策,鼓励慈善组织与科技企业参与高素质慈善人才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例如,慈善组织可尝试与互联网企业合作,依托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契机及其IT人才储备构成志愿者力量,为慈善组织数字化建设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在行业层面建立数字公益人才数据库,推动慈善组织人才数据共享,促进数字公益人才培育和使用创新。慈善组织自身也应加强组织内数字人才以及其他员工的数字化能力培训,不断优化组织人才结构和技术禀赋。

二是建立行业认可和激励机制。应持续完善慈善行业的职业评价体系,提升慈善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可度。同时,慈善组织应当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福利体系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培训机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从而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加入。

三是推动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改革。应当在高校设立公益慈善专业,也可以在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中加入“数字公益创新”等课程,通过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公益意识、实践能力,提升其数字化技能和创新能力,使其具备适应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还要持续加强高校与慈善组织的合作,积极开辟学生了解和参与慈善事业的实践机会和实习岗位。

#### 2. 和衷共济:夯实公益慈善数字底座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进入发展爆发期,公益慈善行业的数字化也成为公益慈善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内在要求。建设一个开放互助、共创共享的公益数字化生态,需要群策群力。

一是多方主体协同发力。首先,要加强慈善行

业和慈善组织内部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和理解,明确数字化对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其次,鼓励科技企业、大型慈善组织与中小型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科技企业的技术支持,推动慈善组织对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再次,通过积累行业基础数据,开展行业洞察,进而打破数字壁垒,弥合数字鸿沟。最后,政府部门不仅要建立健全慈善事业数字化发展的监管机制,加强对慈善组织数字化项目的审核和监管,确保慈善组织数字化过程中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以及项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还要营造良好的慈善生态环境,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数字化建设。

二是处理好技术与价值的关系。当前,互联网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可能性。为最大化地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规避其风险,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秉持科技向善的慈善理念,明确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通过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包括设立专门的道德委员会或行业监督机构),明确慈善组织的数字化运作标准和责任义务,监督和约束数字慈善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还要确保互联网募捐权能够合理分配给那些具有较强公益性和较高社会价值的慈善组织,并通过提高慈善组织共享互联网募捐平台数据信息的能力和水平,强化慈善组织服务受众的能力建设。

三是廓清对新型慈善工具的基本认识。萨拉蒙在《慈善新前沿》一书中大力提及金融工具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他认为:“慈善事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工具来‘撬动’慈善事业的主体性,而不能依靠传统的输入式。”<sup>[33]</sup>因此,我们不能将以金融为代表的新型慈善工具简单归类为具有特定政治或经济属性的慈善工具,而是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将慈善事业充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并基于我国国情充分改造和利用新型慈善工具,推动新型慈善工具实现更有效的技术开放与赋能,并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实现趋利避害。

### 3. 融合为要:拓展慈善事业劳动对象

新质生产力在慈善领域推动劳动对象的拓展,可以推动慈善事业与社会各方面的深度融合,从而更好地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慈善事业的良好氛围。

一是提高对劳动对象转型的认识和支持。首先,构建学习共同体。由科技类社会组织牵头,组织各类慈善组织形成学习共同体,定期开展关于新质生产力与慈善事业融合发展的研讨活动,促进观念

更新和知识共享。其次,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创建针对传统中小型慈善组织数字化转型的专项扶持基金,助力其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能力和技术水平。最后,开展试点项目。选取部分地区和慈善组织进行新质生产力应用慈善事业的试点,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可推广的模式,逐步引导其他组织跟进。

二是弥合算法模型与慈善需求的缝隙。首先,拓展信息收集渠道。通过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深入基层,主动发现和收集难以被纳入算法模型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其次,建立特殊群体帮扶机制。针对大数据信息难以触及的弱势群体,设立专门的帮扶项目和工作流程,确保此类群体的复杂情感和真实诉求能被关注到。最后,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交流。推动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合作,共同研究和解决慈善需求中面临的复杂问题,鼓励技术研发人员将更多的情感和人文因素纳入算法模型的设计和改进。

三是推动慈善事业的融合发展。首先,建立慈善事业协调机构。通过搭建跨部门、跨组织的沟通平台,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以加强不同部门和慈善组织之间的统筹协调。其次,建立明确的合作规则和责任机制。通过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平衡各领域之间的利益,促进合作,进而推动形成慈善事业发展联盟。最后,推动“数实”融合发展。坚持运用新发展理念,大力强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动“互联网+公益慈善”向民生服务、公众素质素养培育等新场景、新领域拓展。

### 参考文献

- [1]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1).
- [2] 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社会科学辑刊,2024(2):114-124.
- [3]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6-159.
- [4] 韩永军.新质生产力本质是高新科技驱动的生产力[N].人民邮电,2023-09-13(1).
- [5] 张震宇.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转型逻辑与实施路径[J].学术交流,2024(1):93-107.
- [6] 王飞,韩晓媛,陈瑞华.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24(6):12-19.
- [7] 侯冠宇,张震宇.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 (3):93-100.
- [8]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 [9]苗青.助力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掣肘与重点举措[J].社会保障评论,2022(5):90-101.
- [10]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J].哲学研究,1997(6):13-17.
- [11]厉以宁.文化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26.
- [12]王宁.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14.
- [13]李实,万海远.中国收入分配演变4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7.
- [14]白光昭.第三次分配:背景、内涵及治理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20(12):120-124.
- [15]吴磊.数字化赋能第三次分配:应用逻辑、议题界定与优化机制[J].社会科学,2022(8):146-155.
- [16]宫蒲光.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下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21(2):6-13.
- [17]郑功成,王海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J].学术研究,2022(9):99-106.
- [18]谢琼.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M]//王名.中国非营利评论: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1-26.
- [19]张卫,张硕.“互联网+慈善”新模式:内在逻辑、多重困境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21(11):91-97.
- [20]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M].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26.
-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6.
-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 [23]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5.
-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
- [2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 [26]米加宁,吴佳正,董昌其.数据生产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机理与规律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9.
- [27]郭林.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动态(2022年)[J].社会保障评论,2023(1):63-79.
- [28]周缘园.中国慈善服务的理论释义、实践探索与未来路径[J].社会保障评论,2024(3):127-144.
- [29]陈柯宇,王晓慧.《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报告2021》发布:公益慈善教育加速发展,学科建设短期难有突破[N].华夏时报,2022-01-27(2).
- [30]明宏伟.数字公益: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公益蓝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125-126.
- [31]杨方方.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J].社会保障评论,2024(1):126-143.
- [32]杨团.一场新的慈善革命:“慈善资本主义”与公益伙伴关系[J].学习与实践,2007(3):97-105.
- [33]萨拉蒙.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M].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2.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Li Jian    Ma Chuangjun

**Abstract:** Every leap and upgrade in productivity in history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it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y analyzing the fit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ity, it can be found that charity, as the superstructur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not only need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ystem a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need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evel. Specificall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jects momentum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causes by enhancing workers' skills, improving labor materials, and expanding labor targets. However, due to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ity in terms of workers, labor materials, and labor objec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ultivate high-quality charity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 solidarity, and integration, help charity technology take off, expand the labor objects of charity, and maximize the innovativ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hilanthrop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翊 明